

男儿国 里的 公主

谭 谈 著

DE GONG ZHU



NA

男儿国里的公主

谭谈 著

1986 · 北京

· 工人出版社 ·



2 034 4364 8



男儿国里的公主

谭 谈 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(北京安外六铺炕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12.375 字数:295,000

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4,980 册

统一书号: 10007·170 定价: 2.55元

目 次

代序.....	(1)
那一个秋天.....	(11)
留给妈妈思考.....	(26)
山道弯弯.....	(45)
山雾散去.....	(117)
山女.....	(184)
月亮溪.....	(256)
男儿国里的公主.....	(311)

我的幸与不幸

——代序

每个人的生命进程中，将有许多幸事，也将令人遗憾地碰上许多不幸。

应该说，我是时代的幸运儿。不是吗？当我挎枪守卫祖国边疆的时候，适逢“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”；当我复员穿上工装，成为煤矿工人的一员的时候，正值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”；当党和国家“尊重知识，重视知识分子”的时候，我又跻身于作家行列之中……

然而，幸运儿也有他的不幸。

我的不幸是什么呢？

让我从这里说起吧

下午的会，又接着上午的内容开始了。几天来，这家省级新闻单位，正在进行一项紧张而又颇具诱惑力的工作——评定职称。前两天，几位老同志从而容之地“过关”了。下面，该轮到谁了呢？

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。

我终于忍不住了：“我来吧！”

于是，我把预先填好的那份表，打开来，念了一遍。接着自报“记者”职称，交给大家“公议”。

一切都十分顺利，眼看要过关了。就在这评议接近尾声的时

候，一位老记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

“你有二十年的写作历史，发表和出版了百余万字的作品，遗憾的是没有一张文凭。如果有一张大学文凭，你完全应该报更高一个档次！”

“是呵，我们老谭就是少这么一样东西。别人会说他没读书……”有人接着半带同情、半带疑难地说。

我素有“热血动物”之称，遇事易冲动。这时，一股热血直往我脑门顶上涌。“少一样东西”，我到底少一样什么东西？从新闻消息、通讯、言论、摄影到小说、散文、电影文学剧本，我哪一样没有拿出过东西来呢？我到底少了哪一样？我没有读书，可我写书啊！我这个没有读书的人，写书给那些读了书的人读……

这串充满偏激情绪的气话，终于象钢弹子般地从我嘴里蹦了出来。事后想来，自觉汗颜。这未免太自傲了。但在当时，我真顾不得这么多了。

我的话，使全场哑然……

是的，我没有读书

如果说，文凭是读过书的唯一标志的话，那么，我的确没有读书——我连一张初中文凭也没拿到。

我出生在湘中山区的一个穷山村。1950年，我6岁，就高高兴兴地走进了那所新办起来的山村小学。读高小时，学校离家远了。家境好一些的同学在学校住宿。我家里穷，只能每天走读。挖红薯的季节，妈妈往我的书包里放上一个生红薯，作为我的午餐。春荒时节就更糟了，早晨吃一点菜叶子掺和糠粉的糊糊，中午饿一顿，熬到太阳偏西，放学回来时，双腿发软。十几里山路，我要歇几次，出几身冷汗……

读五年级时，少先队辅导员找我谈话，要我申请入队。我哭

了：“老师，我不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老师惊讶了。

“我，我没有红领巾钱。”

老师激动了，为我交了三角六分的红领巾费，吸收我加入了少年先锋队。

读到初中二年一期，我14岁了，个头怕有1米60了。我决计告别学校，到社会上找一个饭碗。兄弟姊妹中，我最大，我不忍心再让家里供我。

1959年3月，我来到离家50里远的大跃进办起来的省属涟源钢铁厂，要求进厂当徒工。一位女干部将我上下打量了几遍，一次又一次地摇头：

“不行，你年龄太小了，我们不能收童工。”

“不！我已经17岁半了。”

我虚报年龄，而且还加上一个“半”字，以显其真实。这位女干部被我缠得没法脱身，只好出题目考我的文化。没想到，这场文化考试却增添了她对我的好感，终于开出一张条子，让我到职工医院检查身体。

我兴高采烈地跨进了医院大门。

一位在医院实习的女大学生把我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。

我满面通红地走出了医院大门。

我期待着……

但不知哪个环节卡壳了，我还是没被录取。我只好自动降级，从这家省属大钢铁厂，来到一家县属小厂——涟源县杨梓铁厂。

这年6月，我终于走进社会。进厂的第二天，便是我15岁生日。

我真不愿承认自己没读书，只承认自己没在课堂上读书

我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——16元整，扣去伙食费外，我握

在手里的是1元6角钱。这一元多钱买什么呢？我想到了书。

我买回一部精装本的《红旗谱》，一页一页地啃起来。书，把我带到了另一个世界。我开始迷恋上书了。

这期间，我读了《红旗谱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、《踏平东海万顷浪》……

1961年3月，工厂停办，我被调到煤矿。几个月后，便投身到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。

连队驻在南海边。军营里，有一个阅览室，里面放着《解放军报》、《战士报》、《解放军文艺》、《中国青年》等多种报刊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书。第一次走进这个阅览室，使我大开眼界。我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呵！

我迷上这方角落了，一有空，就来到这里。在连队，时间是非常紧张的。白天，繁重的训练和劳动；晚间，要站岗，要巡逻……为了挤出时间读书，一天紧张的训练（或劳动）结束后，战友们围在水井边，痛痛快快地洗澡、洗衣，我却是用三两桶水从头到脚一冲，降低一下温度，就算是洗了澡。衣服穿得很脏了还没洗，常常是指导员提着我的衣领督促我：“小谭，该洗洗了！一个解放军战士，不能这么脏呀！”这时，我才脱下来，先用削铅笔的小刀，将衣领上的油泥刮掉一层，再下水……

连队阅览室里的书，很快被我“啃”完了。买书，我又没钱。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领地。那是离我们驻地不远的的一个劳改农场的图书馆，这里的书比连队阅览室里的要多。于是，我常钻到这里来看书、借书。

图书馆的管理员，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。一次，他向我提出：“能不能给我一双你们部队上发的解放鞋？”

为了以后看书、借书方便，我送给他一双新发的解放鞋。

当天晚上全连集合晚点名时，指导员严厉地叫到了我的名

字：

“谭达成，出列！”

我愣住了，闹不清自己闯了什么祸。

“这，是你的吗？”

这天晚上，没有月亮。指导员站在队列前，手里举着件什么东西，但我看不真切。

“什、什么？”我怯生生地问。

“鞋子！”

我浑身颤抖了一下。看来，自己送鞋给那个管理员的事被人“告发”了。然而，这错了吗？错在哪里？

“同志，要经常摸一摸自己头上的帽徽，摸一摸衣领上的领章！一刻也不应该忘记，自己是一名无产阶级战士！那个老头，是一个刑满留场就业的劳改释放犯！”

为此，我受到有生以来第一次，也是唯一的处分——警告。一直当我复员离队时，这个处分才从我的档案袋里取出。

没有读书的我，学着写书了

书，使我着迷；我，学着写书了。

我的文学道路，起步于连队的黑板报。

入伍半年后，我被选为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墙报委员，负责编写连队的墙报、黑板报。就在我编写的第一期黑板报上，刊登了自己采写的一篇四五百字的小通讯——《假日里的忙人》，记述一位来自武汉市的新战士，节假日不休息，挑着粪筐为部队大生产积肥的事迹。没想到，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我从生产工地回连队，战友们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，嚷着：

“谭达成，你的名字上报了，你的名字上报了！”

热心的文书，还将刚到的一份《汕头日报》递过来。果然，报

纸的第二版上端，刊登着我写的那篇小通讯。文章末尾，印着我的名字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并没有投稿呀！后来我才知道，就在那期黑板报出版的当天，团部的宣传股长下连队检查工作，看到这篇小通讯写得挺活，于是，便抄下来，推荐给《汕头日报》了。

这是我们连队第一次见报。连长召开全连大会，亲自朗读这篇文章。接着，指导员又在大会上表扬我。散会后，这个对新闻工作似懂非懂的指导员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小谭，好好干！多写稿，多投稿。稿子在驻地报上发表，新华社就会转发。新华社一转发，你们家乡的报纸就会登。你们家乡的报纸一登，你的父母亲就看到了。”

我写作的积极性更高了。写超期服役的老战士，写任劳任怨的炊事班长，写严以律己的副指导员……一篇一篇的通讯稿写好后，交给文书投寄出去，结果，一个字也没有发表。

我并没有泄气，倒是憋了一肚子的气。这时，我看的书也多了，渐渐懂得了什么叫小说、散文了。通讯稿不能发表，我决心写小说试试看。

1964年春节。天空，亮得喜人；大海，蓝得可爱。我躲进营区前的芭蕉林里，偷偷地写开小说了。这是一个记述自己参军的真实故事。

1961年是饥饿的一年。我当时十六七岁，正是吃“长饭”的年龄，却偏偏没有饭吃。一年一度的征兵开始了。我听说部队里能吃饱饭，便报名应征了。接兵的军官要我回家去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。我当时工作的煤矿离家80里路。我不想回去，怕父母不同意，反而惹出麻烦。于是，我用接兵干部当时动员我们参军用的口号回答他：“不用回去征求他们的意见了，我父母亲会同意的。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嘛。”

我将自己简单的行李清理好，交给了煤矿武装部，请他们代

我寄回家去。

就要告别故土，远走高飞了。我心中萌生出一个简单的要求：吃一顿饱饭。我偷偷地将自己的一床八成新的蚊帐取出来，与别人换了三斤半大米。找一个人合作，我出米，他出油。将米磨成粉，炸成油粑粑，两人美美地吃了一顿。然后，启程到那座新兴的工业小城——湖南省冷水江市集中去了。

离矿时，矿里发给我们三个月工资。一来到这座新城，我又想到吃，便走进了一家面馆。正是7月，天气极热。吃热面时，便光着身子上阵。吃饭以后，心里很美气，哼着小调，走出店来，到资江里洗澡去了。

到河里玩了一通水上来，太阳西斜了。微风吹来，颇有些凉意。这时，我才发现自己的衬衣不在身上，赶忙跑回面馆去寻，早没影了。就这样，我的衬衣和放在衬衣口袋里的三个月的工资一起丢了。

这时，我身上只剩下一条内短裤了。从市里去矿区，有三十多里路。当时还没有公共汽车。而且，矿区武装部也许已把我的行李寄走了，回矿里也不一定有自己的衣服。怎么办？

正在这左右为难的时候，响起了哨声，新兵连集合发军装了。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光着膀子，穿一条短裤，排到了领衣的队伍后面。

花了整整一个月的业余时间，把这个参军的故事写出来了。这一次我不敢把稿子交给文书了。投了那么多新闻稿没有被采用，现在居然写小说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。我怕人家笑话自己。星期天，我请假外出，专程来到小镇邮电所，慎重地买了四张八分的邮票贴上，将稿件投进那个绿色的邮筒。

一个月左右，稿件退回来了。里面夹了一张铅印的退稿条。第一次见到退稿条，颇觉新鲜，偷偷地看了好几次。此后，我一

次又一次地接到退稿条，心里一次比一次不是滋味。每一次收到退稿，心里象遗失了珍贵的东西似的，闷得很，慌得很。继而，又象路见敌情般不服气，决心再一次冲刺。

转眼八个月过去了，我收到十二张退稿条了。这时，我又开始了第十三篇小说的写作。我以前的习作，多是原原本本写生活中的真事。一次次的失败，加上近一年的看书学习，使我懂得，文学创作要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所谓高于生活，就是要善于对生活素材进行提炼、概括、剪裁和艺术虚构。写这篇小说时，我开始学着这样做了。

参军后，我被分配在一个步兵团的工兵连木工排。到部队不久，我们排来到拦海围田工地修制木制水闸。一天，我正在一根木梁上凿眼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喊：“喂，你们是哪个单位的？”

我们循声望去，只见水沟对岸站着三个人。其中一个，四十多岁年纪，领章上二根杠，四颗星——大校。我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首长。

排长连忙迎了上去：“报告师长，××团工兵连一排在执行任务。”

师长走过来，一一和我们握手，拉话。当他和我握手时，问我是哪里人，什么时候入伍的，今年多大了。我涨红着脸，不敢答话。当排长代替我回答后，师长亲切地笑了：“湖南人？呵，我们是老乡呀！”

次日，我去执行任务，又在海堤上碰上了这位师长。我真想举手向他敬一个礼，手却一直没有举起来。师长认出我来了，笑着先开口：“是小老乡呵！干啥去？”当我怯怯地回答他后，他挺有气势地一挥手，说：“小伙子，好好干！现在，我们眼前是一片荒凉的海滩，明年这个时候，我们眼前的荒滩，将变为一片稻海。”

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我在工棚里睡得正香时，突然被人挤醒了，心中老大不悦，嘴里便不干不净地嘟囔了几句。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看，睡在我身边的，竟是我平日最尊敬的，把我的黑板报稿抄下来推荐给《汕头日报》的那位宣传股长。我的脸倏地一下红了……

我听老战士们说，我们军另一个师的师长，是塔山阻击战中著名的战斗英雄。他的一只眼睛，在那次战斗中被打瞎了，现在一直戴着一副宽边墨镜，他常到连队给战士们讲战斗故事……

我目睹的这位师长和股长，我耳闻的这位战斗英雄，渐渐地在我脑海中溶为一个形象——我的第十三篇作品中的师政委。这篇稿子，终于敲开了编辑部神圣的大门。这就是我的处女作《听到故事之前》，她发表在《解放军文艺》1965年2月号上。“谭谈”这个名字随着这篇习作第一次面世。从此，我摇摇晃晃地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迷人而艰辛的路。20年来，除“文革”中搁笔六七年外，我一直在练笔。1979年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《朝晖》文学丛书，我的第一本书——小说、散文集《采石场上》，便是其中的一本。1981年，发表了《山道弯弯》，并以此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不久，我又将它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搬上银幕。接着，我将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编为一书出版。1982年，我发表了长篇小说《风雨山中路》；1984年我的第一本中篇小说集《山女泪》出版了。现在，我的第二本中篇小说集《你留下一支什么歌》又下厂排印了。前不久，我完成了又一部长篇小说《萌动的山地》……

在文学创作这条荆棘丛生的路上，我每一步都迈得十分艰难。然而，我毕竟还是幸运的。

留下几句牢骚话，供人们思考

拙文写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。然而，我还想再说上点什么。

上山不只一条路。大路、小路，条条道路通峰顶。知识的获得也是如此。

今天，我们的党和国家“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”，这是令人欣喜的。然而，现实生活中只是鼓励青年自学成才，却很少认真地、实事求是地承认那些自学之才。

一位发表、出版过一百多万字作品的工人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的副主席所在的单位的组织部，通知中年知识分子体检时，却没有通知他。理由是：上面规定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的中专以上毕业生才能算中年知识分子。他没有文凭。

朋友，当年，当我们的同龄人，走进课堂时，我们，或牺牲自己应得的那份阳光的温暖，下矿井，用双手取出煤炭，供给人们以阳光外的温暖；或肩扛钢枪，守卫祖国的大门，让同龄人得以在和平的环境里认真攻读。当那些幸运地步入学校大门的同龄人奔腾在运动场上时，当他们安静地坐在影院里时，当他们在轻曼的乐曲中翩然起舞时，我们或在树林里，或在煤油灯下读书。难道只有在课堂里读的才算书，在课堂之外读的，就不算书吗？

文凭呵，你到底意味着什么？知识？能力？水平？还是……

让这篇早该结束的拙文，拖到这个不该结束的地方结束吧！

那一个秋天

秋天，收获的季节。岁岁金秋，给人们带来多少欢欣和幸福，留下多少美好的记忆！

然而，闪光的碧玉也有瑕疵，秋天，也不是个个都是丰收的图画。在我心灵深处，就有那么一个秋天：灰暗、混乱、多雨、多灾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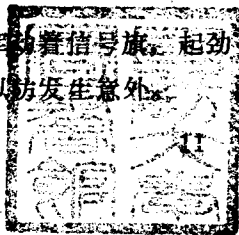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七五年秋。

雨，赶在晚点的火车进站之前落开了。

这是一个山区小站。狭小的站台上，挤满了人。挑箩筐的，推自行车的，抬运家具的，担猪崽仔的，把一块小小的站台挤了个水泄不通。火车刚刚滑进站，还没有停稳，站台上候车的人，就争先恐后地准备上车。

“嘿——嘿——！”

车站上两个穿着蓝色铁路制服的工人，挥动着信号旗，起劲地吹着哨子，指挥上车的人不要靠近火车，以防发生意外。



急于上车的人没有理睬这些，仍然叫叫嚷嚷，向车厢边靠拢，一片乱哄哄的。

列车终于平安地停稳了。瞬间，一个个车门口蜂一般窜过来一大片人。竹筐、木桶、麻袋、皮箱、堆了一大堆，把车门堵了个严严实实。列车员从人堆中挤到车门边，艰难地打开了车门，人们使劲挤将下来。我，痛苦地瞅了瞅这情景，也夹在下车的人们中，任潮水似的人流冲下车来。来到车门边，一眼看去，车站的建筑物上，悬挂着一幅大标语：“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，不要修正主义的早点。”“革命”标语与这混乱场面形成对照，产生一种异样的气氛。

这时，老天爷抖威风了。黑沉沉的天幕上，闪过一道光鞭，“轰隆隆”劈下一个大炸雷。钢弹子般的粗大雨点，噼哩啪啦地抛了下来，打在水泥地板上，“梆梆”直响。掉在人的脑袋上，隐隐作痛。

上下车的人流更加慌乱了。下车的，面对着滂沱大雨，畏缩着不敢跳下车来。上车的，大雨劈头盖脑地打下来，总想早一点钻进车厢里去。叫声，骂声，孩子们的哭声，混成一片。

手握信号旗的车站工作人员，面对这慌乱的场面，极力维持着秩序。然而，没人听，没人理，他们终于败下阵来。哨子不吹了，旗子不摇了，无能为力地退让到了一边。

雨更大了，水泥地面上淌着水。雨点落在水面上，溅起一丛丛水花。风，沿山而来，在粗壮的雨柱里，卷起了白茫茫的水雾。雨幕中，那幅“革命”气味极浓的标语，格外醒目。我的心里，又陡地增加了一份重量。从这幅“社会主义的晚点”的漫画中，我看到了此次重返矿山，再干一把手，前进道路的艰难，肩上担子的份量！

我下车了，光着脑袋钻进了雨中。

“老岳！”

喊声似雷，话音又惊又喜。我转头一看，一股喜悦之情，钻心而出。呵，我笑了笑，道：“小海，是你！也坐的这趟车？”

“不。听说你调回来了，我想早点儿见到你。”

一把大布伞伸了过来，遮住了我的身子。伞布上的水，沿着布沿哗哗而下。我和小海肩靠肩，迈步前行。小伙子二十六、七岁，中等身材，英俊威武，是矿里有名的猛虎掘进队队长。几年没见面了，身子骨变得更结实了。

“我爹，可想你了。”小海说。

“呵，这闷老头身体还好？”

“硬朗。”

“脾气？”

“老样子。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嘛。”

“一天到晚，还那么闷？”

“嘴巴闭得更紧了。”

一道闪电，一声炸雷，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风雨更大了。对面望龙山上白茫茫的雨雾席卷而来，树林里响起了尖锐的啸声。

“我们到候车室看看吧。说不定我爹在那里等你呢，他听到你将回矿的消息，天天来车站接你。今天……”

这闷老头子，真贴心呵！我的心不由得格登一跳，点了点头：“好。”

“嗯，嗯。”

这时，身后有人连连“嗯”了两下。多么熟悉的声音呵！我赶紧转过身去，果然，是他！是这一位贴心的闷老头。六十开外年纪了，腿脚还非常灵活，背微微驼着。松树皮似的脸上，终日平平静静的。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，也没有多少笑容和什么特别的表情。他一手撑着一把伞，一手握着一把伞。上身的对襟青